

口述史访谈与历史场景的搭建*

——基于口述史访谈者的研究

胡 洁

提 要：伴随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一项社会实践经历了三次规模性推进。本文基于对 26 位口述史访谈者的研究发现，通过对个人生命史的挖掘，研究者（访谈者）与亲历者（被访者）共同参与了历史场景的搭建。这一搭建主要包括倾听—提问、回忆—讲述和叙事—选择三个过程：倾听—提问不仅是访谈顺利进行的前提，也是研究者与亲历者共同重返历史场景的“步道”；回忆—讲述涉及亲历者对个人生命史的整体性回顾，并因与研究者的互动而具有“沟通记忆”的性质，同时也与遗忘有着紧密的颠颠关系；叙事—选择则包括对过往的重新梳理和建构，这既受到集体记忆框架的制约，也受到不同形式的“他人在场”甚至社会结构的影响。最后，以费孝通先生的“进得去”和“出得来”为题眼，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口述史访谈中的共情与抽身，强调应将个人生命史的研究融入广袤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

关键词：口述史 倾听—提问 回忆—讲述 叙事—选择 共情 抽身

一、学术背景与研究缘起

1979 年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乃至社会性实践，口述史与集体记忆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胡洁、周晓虹主编，2023）。以规模性推进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工业建设亲历者的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项目编号：21BSH025；主持人：胡洁）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项目编号：NJU-ZYR-01005；主持人：周晓虹）的中期成果。感谢周晓虹、黄蕊、刘柳、陆远、锋竹沁等师友给予的指导和帮助，也感谢云南大学“首届魁阁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社会学 2023 年年会“口述史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论坛”上评议人的意见和建议。

标准，刘亚秋（2023）划分了口述史研究的三个叙事时段。其一，20世纪90年代，孙立平和郭于华联袂主持了“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这一项持续了十多年的口述史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方慧容，2001；应星，2009；郭于华，2003，2013），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农村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二，21世纪初，王汉生和刘亚秋采用口述史方法开展知青群体研究，围绕社会记忆的主题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关“青春无悔”的话语分析产生了相当的学术影响（刘亚秋，2003；王汉生、刘亚秋，2006）；其后，应星、孟庆延等人也开启了“源流”的问题意识，并提出重新将“革命”这一经典母题带回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应星，2016；孟庆延，2018，2022）。其三，2019年以来，周晓虹主持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项较大规模的口述史研究项目，这两个研究项目在近五年的时间里，累计访谈了千余位见证了新中国发展的亲历者，分析和探讨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及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孟庆延，2022；刘亚秋，2023），迄今已产出多项研究成果（常江潇、周晓虹，2021；董方杰、周海燕，2021；王余意、周晓虹，2021；周晓虹，2022a），并带动了口述史与社会记忆领域新的兴盛。

在上述周晓虹主持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中，对40位当代中国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工作尤为重要。这项工作不仅实现了中国社会学自重建以来的学科历史叙事，而且通过出版口述史著作（周晓虹主编，2021）及撰写一系列相关著述（高玉炜、周晓虹，2021；周晓虹，2022b，2023；彭圣钦、周晓虹，2023；胡洁、周晓虹，2023），使得一批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在被研究中见证了口述史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独特性与重要性（王小章，2021）。这种独特性与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个体生命史的口述史，基于社会史与个体人格之延展，能将一定时期内的“先”与“后”衔接起来，从而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经验（Giele & Elder，1998）；而就具体的社会现象而言，“只有将某一现象放入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中进行评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本质作用”（阿德勒，2016：78）。一如米尔斯所言，“如果不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并置理解，就既不能把握前者，也无法洞悉后者”（Mills，1959：3）。

为进一步探讨口述史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意义，我们围绕“口述史的访谈经历和个人感受”，对26位参与“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或“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

研究的访谈人及其助理进行了访谈。^① 他们的身份也从口述史研究项目中的访谈者转变为本文中的被访者。如前所述，这一以南京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口述史团队从事口述史研究近五年，均多次参与该项目的访谈，其中既包括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也有初出茅庐的研究生。具体说来，在这 26 位被访者中，男性有 9 人，女性有 17 人；专职教师（含博士后）11 人，博士或硕士研究生 15 人；大多为社会学专业的教师或该专业的研究生，另有 1 人为心理咨询专业的教师，1 人为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但基本上都具有社会学背景。其中，有 16 人曾全程参与了研究团队的各项大规模口述史的调研工作，具体内容包括访谈大纲的讨论、现场做口述史访谈、访谈资料的整理和口述史文稿的撰写，平均每个人主访或参与访谈过 20 个以上的个案。对这部分人的访谈于我们还原口述史访谈的现场、理解口述史访谈过程中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有着独特的意义。

尽管就内容而言，口述史与一般的社会学访谈不同，它更强调被访者的个人生命史、历史记忆或所述问题的纵深感（胡洁，2020）；但从形式上说，口述史的采集依赖于访谈。可以说，每一项口述史的生成都是访谈双方交流、分享、建构的结果（Thompson, 2000: 21—23, 222—245; Ritchie, 2015: 73—102）。如果将口述史研究视为与亲历者一道搭建某个历史场景，或者说通过与亲历者互动共启一场个人生命史的回溯之旅，那么对于访谈者来说，在短期内要促成亲历者打开心扉实非易事。诚然，参照各种操作手册，我们也许可以“完成”或“做”一个口述史访谈，但要“做好”，就要努力通过倾听—提问、回忆—讲述和叙事—选择，实现历史场景的重返、复现和建构，并最终成功地将口述历史带入我们对话的分析框架之中（胡洁，2021）。

二、倾听—提问：历史场景的重返

口述史访谈由讲述和倾听两个方面构成。对于历史场景的搭建来说，讲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倾听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时更为重要。首先，倾听是访谈得以顺利

^① 基于研究伦理，本文对 26 位被访者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为体现年龄（出生年代）、性别、职级对访谈的影响，编码方式为：年龄（出生年代）+ 性别（男性为 M，女性为 F）+ 职级（教授为 P，副教授为 A，讲师、博士后或助理教授统一为 L，研究生博士为 D，硕士为 M）+ 姓氏排序（三位）。例如，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团队中姓氏排序第 12 位的一位女教授就写作 80FP012。

进行的前提。里奇（Ritchie, 2015: 73）在讨论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访谈者时就提出，“所有的访谈者都需要让被访者轻松自在，仔细倾听他们想说的一切，尊重他们的意见，并鼓励坦诚的回应”。其实，倾听传递的是一种态度，被访者只有感觉到被尊重，诚恳的讲述才有可能性。这种认真倾听的态度呈现，在以困难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口述史访谈中尤为重要。显然，当被访者和访谈者之间存在某种社会地位上的落差时，单单使用敬语无法克服相互间的隔膜。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认真的倾听是行动式的，是骨子里铭刻的对亲历者甚至历史本身的敬畏立场和理解姿态。否则，“那些忍不住滔滔不绝的人，或是总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反驳或强加于被访者的人，只能得到毫无用处或者完全误导的信息”（Thompson, 2000: 222）。

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倾听不仅是访谈顺利进行的前提，倾听从本质上说是访谈者与亲历者共同重返历史场景的“步道”。在这一重返之旅中，被访者是那段历史或事件的亲历者，但重返的动因却往往是访谈者试图探寻历史奥秘的研究意愿或提问。因此，这场重返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回到历史场景之中，既取决于被访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历史向导的意愿，更取决于访谈者向亲历者提问抵达历史场景的真挚程度，而倾听就是真挚的基本表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口述史才能作为方法，我们才能够通过倾听—提问，经由亲历者个体的口头叙述实现对一个时代及其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也可以借由口述资料来发现或研究历史中的事件与行动者的轨迹（周晓虹，2021）。通过向亲历者提问，倾听他们的生命史铺陈，助其完成个体记忆的复现和集体历史的叙事。

进一步，倾听并非单纯的信息接收或听力活动，倾听是包含思考的智力过程，与其相随的提问质量就是对这一智力过程的检验。在本项研究中，许多访谈者都强调了“现场思考”的重要性。因为“无论你是一个记录者，还是一个研究者，你首先要是一个倾听者。你一定要把他（被访者）的话听进去……你会想这个（话）里有什么东西？你下面可以再怎么问？现场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单）靠后面听录音是没有用的”（80ML013 口述）。在口述史研究中，只听录音无异于在田野研究中使用二手材料。这样虽能节省资料收集的时间，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的疏离。并且，更紧要的是，田野或访谈现场的缺席也会抹杀这一过程中经由观察和思考所可能带来的理解意义上的丰富感。如果说“田野调查中我们所遭遇的‘事实’是多层次的，有些是水面的波澜泡沫，有些是水下的潜流暗礁，而这些不同层次‘事实’之间的联系要靠田野中的摸索才有可能把握”（周飞舟，2021:

52), 那么在口述史访谈中, 也只有田野或现场中的倾听与提问才能有效地连接历史事件与亲历者的关联并激发访谈者的历史想象。

倾听涉及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 访谈者要留意被访者的讲述逻辑是否一致、前后是否有冲突。这种逻辑冲突有时表现在叙述层面, 有时表现为情感领域。如果出现前后不一致, 就需要思考引起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是记忆的紊乱、刻意的转变还是情感的矛盾。一般而言, 除非是记忆的错讹, 冲突往往反映了人物内心的某种纠结, 此时应该特别留意并进行记录, 以备后续通过提问求证和分析。其次, 倾听要具备相当的学术敏感性, 由此才可能引发后续的提问。在访谈中, 如若遇上不吝表达的被访者, 那么听故事则会成为口述史研究的一大乐趣, 有时“正是这些故事, 对个人生活的叙述, 吸引了我们大多数人去研究口述历史”(Shopes, 2015: 106)。在倾听的过程中, 访谈者表现出兴趣和好奇可以激励被访者的讲述, 但应该意识到, 讲故事的过程也常常是被访者构建自我的重要方式, 是一种“叙述性的自我认同(narrative identity)”(杨善华、孙飞宇, 2005)。^①最后, 要留意被访者的语气变化, 特别是叙述过程中出现的转折、停顿或重复。这些是在最终的口述史成文稿中极易被忽视甚至被剔除的重要细节, 需要在访谈过程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下, 或用不同的语气说出, 可能都会蕴含着不同的意义。

而在口述史访谈中, 有效的互动并非单纯的倾听。除了访谈者的眼神、表情和回应性的手势或肢体动作外, 既有节制同时又有意义的提问更为重要。作为带有研究目的的访谈, 提问不仅把控了访谈的节奏, 更决定了访谈者与亲历者携手重返历史场景的具体路径。在本项研究中, 多位被访者都强调了提问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少问多听”的原则下, 提问的时机和质量尤为重要。就提问的时机而言, 几位被访者一致认为“要见缝插针地问问题”(90FL005口述); “特别是在他介绍(自己)生平的时候, 因为生平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 你虽然有很多问题想问, 但是不能频繁地去打断他。做口述史更多的还是以倾听为主, 然后把你的问题适时地插进去问”(80FA008口述)。如何做到“适时地插进去”? 在我们进行两项口述史系列研究时曾有许多精彩的案例。

^① 这至少在两个方面给我们以提示: 一是, 我们要区分“故事”与“真实”, 即对故事进行审慎地听取和判断, 为何这个故事被选择予以表达; 二是, 故事不同于一般的事实陈述, 往往经过了讲述人的言语包装, 掺杂着讲述人的情绪、态度、评价等主观体验, 因此听故事也是我们勾勒被访者心理或情感世界的有效途径。所以在追随故事情节时, 应保持研究的敏感性。

我觉得最精彩的案例，夸张些说能写进教科书的案例，是我担任访谈助理陪同老师（50MP023）做的义乌廿三里“敲糖帮”的那场访谈。被访的老人LZH年近七旬，年轻时做过“鸡毛换糖”的生意，近年来因为不断接受各方访谈，并热心地代为联系亲历者，被人戏称敲糖帮“帮主”。前一天下晚，我们先去与LZH接洽，安排第二天本组和另外一组的几场访谈。结果一见面我先懵了：LZH虽晒得漆黑，身为男性却一身“妖艳”女装：紧身衣、黑纱裙、宽檐女帽和半高跟女鞋……比我穿得都时髦。见面后，LZH陪着老师在村里并肩行走，我跟在后面看不到老师的表情，回去的路上才知道表面自如的老师也很震惊，他也在猜LZH是不是异装癖，但苦于不能直接相问。

第二天，我们按计划访谈LZH。他在自述自己的生平或者说个人生命史时，不经意间突然说到他的妻子对他的各种埋怨，包括不顾家、整天乱跑做一些无用的事（比如接受访谈和去杭州等地参加“马拉松”比赛），特别是说他“穿得不男不女的，太丢人”……我这时听到老师几乎是脊髓反射，接着话题就平和地问道：“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呢？”因为对话太自然，堪称无缝对接，LZH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就解释说因为有一次在杭州跑半程马拉松，天太冷他抓了件女装上场，结果赢得了无数“粉丝”夸赞，后来觉得这样挺抢眼，用上海话来说“拉风”，就保持了下来（80FA008口述）。

就提问的质量而言，最重要的是提问应该切中研究的主题，这与定量研究所要求的所谓“效度”（validity）或研究的有效性相似。因为口述史不仅涉及亲历者个人的生命史，而且也与宏观社会背景或大的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访谈者掌握相关历史知识的繁复程度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尤其当年轻的研究者访谈耄耋之年的老人时，“会有跟对方很难聊到一块的感觉”（70MP019口述）。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为例，前半部五大（群）企业研究的时间节点最早的始于1948年（鞍钢），最晚的也不迟于1964年（三线建设），而访谈人尤其是访谈助理有许多人是“70后”“80后”甚至“90后”，因此如何使他们在重返历史场景前就对这段历史有比较好的理解十分重要。显然，如果对历史不清楚，一进入访谈“可能就卡壳了，如果我想把这个东西弄懂，我就得打断他：‘您刚刚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你想，如果一个访谈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对方可能就觉得（和你谈）没什么意思了”（80FA008口述）。

为了获取历史知识，访谈前显然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既然“对某一段历史，通常都有一个官方的叙事，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专题性研究，有原始史料，（这些）肯定多多少少都要涉及的”（70FP022 口述），那访谈者就得好好去阅读历史文献和原始资料，当然也可以观看电影、电视剧或小说，以期获得某种快速、直观的了解。比如，在2021年做义乌商人口述史访谈前，团队的年轻学生们就被要求去看热播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这部电视剧以男女主人公陈江河和骆玉珠的情感经历和创业故事为线索，讲述了义乌农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的曲折而堪称神话的经历。不过，这种重返历史场景的方式尽管更为轻松，也更易让人产生代入感进而与历史发生亲密接触，但它只是为访谈者进入历史做了粗略的铺垫，不能用经过加工的艺术品完全替代历史现实。多次给导师50MP023做过助理的90FD003就谈到过，2019年在昆明访谈缅共女兵PDX时，尽管事前看过PDX写的回忆录，也看过凤凰卫视对她的专题采访，但那次在导师鼓励下自己担任主访的访谈进行起来还是有些勉为其难：“你以为对她多少有些了解了吧，但在实际的讲述过程中还是会有很多（意外），比如她会突然讲到某种武器，我肯定是不知道的，除非你是一个军事迷，但是那个年代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导师就知道。所以他们两人就会围绕武器又打开一个话匣子。”（90FD003 口述）

历史知识的有效补充增强了访谈者对亲历者生命历程的背景认识，不仅有助于拉近访谈双方的距离，而且有利于访谈者更好地理解亲历者生命历程中所嵌入的社会结构。不过，除了宏观社会背景外，由语境、语汇（术语）和谈资构成的表征亲历者生命历程的话语系统也非常重要（周晓虹，2022a）。汤普森（Thompson，2000：224）曾肯定，在普通民众的研究中，“有关劳动术语（work terms）的基本知识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是建立相互间的尊重和信任的关键所在”。在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中，访谈者们就熟悉了很多“劳动术语”，例如“一拖”人念叨的“156”和哈尔科夫、大庆人嘴边的“磕头机”、三线人口中的“干打垒”，以及廿三里“敲糖帮”们提到的“三把毛”和“严打办”……^①尽管这些术语属于特定地

① “156”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包括第一拖拉机厂在内的156项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乌克兰的哈尔科夫是苏联所属最大的拖拉机厂所在地，也是20世纪50年代一拖的对标设计原型；抽油机采油时像一个磕头的人，因此被大庆人戏称为“磕头机”；干打垒是一种简易的筑墙方式，即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当时不仅在三线建设中常用，也流行于包括大庆油田在内的企业，被视为“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流行的“鸡毛换糖”中，货郎们用糖饼换取公鸡的“三把毛”（公鸡颈部的项毛，背部的尖毛和泳毛，以及尾部的尾毛）是制造出口鸡毛掸的主要材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义乌及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办公室”，简称“严打办”，其不时会抓外出经营的“敲糖帮”（周晓虹，2022a）。

区、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与当今世界已不存在太多的关联，但在口述史访谈中，它们的再现不仅能唤起亲历者的回忆，也能够引导访谈人重返历史场景之中。

三、回忆—讲述：历史场景的复现

如果说从事口述史访谈时，倾听—提问主要还是访谈者的工作路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转而探究这场互动的角色——被访者或亲历者的行动轨迹。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将被访者称为主角，是因为在访谈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访谈者在听被访者陈述，通过回忆复现访谈者不曾置身其间的历史场景。因此，被访者的陈述质量是决定口述史访谈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可以将被访者的陈述具体分为内外两个过程：前者是内隐的、不容察觉的，但却是一种深入而持续的智力活动，这就是回忆（recall）；后者是被访者的讲述（tell），是可以被直观感受的或听到的，讲述是被访者主体能动性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回忆最为重要，是讲述赖以实现的基础，但讲述的过程也在不断地唤醒和重构回忆。

回忆或与此相关的记忆（memory）与讲述是一对相互交织的概念，记忆是讲述的来源，讲述是通过回忆呈现记忆的过程。虽然讲述或口述自古有之，但鉴于“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一直认为记忆是历史的可怜替代品，是对真实发生的事件的片面或歪曲的描述”（French, 1995: 57），因而作为一种特定的史料收集方式，口述史的学科历史十分短暂。^① 口述史学最初之所以广受质疑，就在于其几乎全盘依赖个体的记忆，而记忆本身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是“独尊史料”的传统史学家和实证主义的研究者们不能容忍的缺陷。不过，对口述史的质疑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转变，在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认为口述史提供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真实’”，并断言记忆应该被移到舞台中心，口述史也可以成为“发现、探索和评估历史记忆过程本质的有力工具”，甚至“口述史的特点”如口述性、叙事形式、主观性、记忆的“不同可信度”以及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被视为优势而不是弱点，应该被视为资源而不是问题（Thomson, 2007）。

^① 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口述历史档案馆，这被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

事实上，如果我们关注记忆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记忆的内容，被访者的主体性在访谈过程中就会凸显出来了。长期以来，社会学一直孜孜以求结构性的影响，但正如费孝通晚年对自我研究历程进行反思时所提出的那样，除了对“社会”的研究之外，我们还应该深入对“人”的理解中去（费孝通，2004）。因此，将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费孝通晚年提及的社会学研究转向的一种呼应（刘亚秋，2023）。口述史带我们走进历史中的个体，通过他们对生命史的讲述，复现一个个普通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及其时代。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口述史研究的进展，能够发现人们开始对记忆研究兴趣陡增，甚至出现了研究趋势上的“记忆转向”（钱力成、张翩翩，2015；杨祥银，2016：196）。

进一步，应该指出的是，记忆不完全是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依赖访谈现场中的互动实现的生成实践或回忆过程。过往对这一过程的忽视，相当程度上源于对研究者要“保持中立”的普遍要求，“时至今日，这种要求仍未从经验社会研究的教科书中消失，它放弃了交往理论的基本前提；明明是处在社会互动的框架之内，可是却要保持中立，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韦尔策，2007：112）。交往或互动的存在，使得调查和访谈现场的过程性事件不可能不影响到被访者以至整个研究，比如郭于华（2003）和周海燕（2020）都提及，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在口述访谈的不断推进中，会生出主体性，甚至从生命史叙事的失语者转变为参与者或制造者（刘亚秋，2023）。

在口述史访谈中，与记忆或回忆相关的过程主要有两个方面：记忆的开启与记忆内容的生产。就记忆的开启而言，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面对一个陌生的访员，当被要求谈谈自己的过往生涯时，即使没有戒备心理，一开始还是会感觉“无从说起”。无法回忆，并不是记忆出了问题，而常常是因为感到“没什么可说”“只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不值得说”。那么，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开始自己的回忆？我们常说“触景生情”，当过往的经历及留存的相关记忆与现实中的某个点发生碰撞或重叠，回忆就会开始，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勾起了我的回忆”。“勾”作为一个动词，形象地描绘出主体之外的人、景、事、物对主体记忆的触发。因此，回忆不是自发的反应，而是受到触动后引发的过程。

在访谈中，被访者 70FP022 在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前做过多年的记者，后来一直在新闻系教采访课，对如何访谈驾轻就熟，但她也说有两种人访谈起来比较难：“一种是话说得太多的，他有一套固定的话语，但那不一定是他真实的想法或体验；另一种人你永远猜不到他不说出来的事情，他讲到一个地方突然就不说了。比如，

一些老人谈到‘文革’中的经历时会突然打住，你不方便问，或许别人有心理创伤，你要去硬拉开这个口子不好。”（70FP022 口述）不过，70FP022 也强调，多数情况下如果切入得当，口子一拉开，亲历者的记忆闸门就会打开。

比如，我在贵州做三线建设访谈的时候，碰到过一对铁路上的医生。他们说初到凉山的时候，因为当地少数民族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所以去做（三线）建设非常困难。那个从北京来的老太太对我说，你们根本想象不到有多困难！我就笑眯眯地加了一句：我也是在那（一带）长大的，我也非常理解您所遭遇到的困难。恰巧我妈妈也是医生，我就讲我妈妈当时是怎么去治疗病人的……老爷子听完一拍腿说，说得太对了！这个时候老太太自然就打开了话匣子。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我跟他们在经历上是有连接点的……或者说我懂他们（70FP022 口述）。

当记忆之门被打开之后，如果访谈者言行得当，能够得到被访者的信任，访谈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被访者通过讲述将人生故事逐一浮现，这就是记忆内容的生产过程。记忆以过往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虽然这事实是否可靠已不再是当今记忆研究关注的重点，但它作为一个基本的框架对记忆及其复现仍然有约束力。相对于重现历史来说，回忆的过程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充斥着主观意愿的思维活动，是基于个体理解基础上对过去做的提取和塑造。如此来理解记忆或回忆以及讲述的过程，起码有三点值得关注。

首先，与口述史相关的记忆是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回忆，这是亲历者对自我的一次整体性回顾，而不是其对某个生活片段的随意张望。既然是重访个体生命史，显然对于普通人来说，其所提取的记忆内容整体上就可能倾向于积极正面，他需要从历史的复现中寻求人生的意义感。比如，刘亚秋（2003）就通过为国家承担了苦难因而“青春无悔”的叙事，为当年去农村插队蹉跎岁月的知青找回了自我认同和人生价值。在我们的访谈中，多次参与工业建设口述史访谈并有着良好的史学背景的80ML013 就强调，即使对那些人生并不如意的被访者，我们在帮其梳理生命史或进行历史“归因”（attribution）时，也尽量要归咎于当时的现实需要，或国家政策执行的偏差，而不要归于其个人的选择或能力，“这样起码在那一瞬间他会有一种解脱”（80ML013 口述）。用精神分析的语言，使其整个生命历程获得一次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车文博, 1998: 469) 解释。正是因为口述史“能够为人们树立回忆和解释属于自己过往的信心”, 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为当事人克服孤独和抑郁的怀旧疗法 (Thompson, 2000: 20)。

其次, 访谈现场的回忆及讲述既不是个人笔下的回忆录, 也不是一个人看着窗外出神时的往事回放, 按照扬·阿斯曼 (Jan Assmann) 的观点, 它属于“沟通记忆”, 存在于个体或群体向访谈者回忆过往时的互动实践之中 (韦尔策, 2007: 序4)。因此, 口述访谈中呈现出来的记忆及其生成过程离不开访谈者的影响。在私人日记里写下的回忆和对他人讲述的人生肯定不会完全一样, 后者的差异并非都是刻意粉饰的结果。显然, 访谈者作为整个访谈最初的设计者, 会对被访者的回忆走向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除此之外, 访谈过程中的局部互动也会时刻影响记忆的内容或回忆的方向, 这和没有他人打扰时的自我吟哦有明显差异。在访谈中, 访谈者的提问、插话可被视为原本直线铺陈的记忆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即使访谈者不多言语, 单单“在场”这一事实及眼神和表情等也会对被访者的回忆产生影响。另外, 被访者还要考虑自己的陈述是否得体, 某段私密的经历是否适合讲述, 以及访谈者能否明白自己的讲述, 这些顾忌制约着记忆的最终呈现。

最后, 无论被访者脑海中平静如水还是波涛汹涌, 他对往事的回忆都一定伴随着遗忘, 甚至遗忘常常要大于他的记忆。因为人类一直受困于要更久地保存记忆, 为此常常会努力去“抵抗”遗忘, 但事实上遗忘和记忆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如果说“记忆的本质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 (那么) 遗忘的本质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 (陆远, 2020)。当然, 一如记忆是不断努力“存盘”的结果, 遗忘也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在记忆甚至德拉埃斯马 (2014: 70) 所称的“绝对记忆”和遗忘之间, 应该存在程度不同的变式。比如, 回忆时的思索象征一种模糊记忆的变式, 人们之所以呢喃“哎, 这事儿怎么说呢”, 这起码预示长久没有讲述过这一记忆内容, 他需要重新回忆并组织信息; 错讹的记忆是另一种变式, 它是曾被记忆的事件在时空上的错位, 一如那些富有“既视感” (Déjà Vu) 的历史事件 (Brown, 2003)。不过, 现时人们已经意识到, 有些事实与记忆之间的矛盾反而会提升口述资料的历史价值 (Portelli, 1991: 26)。^①

^① 比如, 因为 20 世纪 50 年代第一拖拉机厂声势浩大, 甚至连毗邻的洛阳矿山机械厂职工回忆本厂的建成典礼, 都会误将一拖的典礼说成自己厂的落成仪式。那是他们虽未曾身临其境, 但被领导或工友再或亲属一再描述、渲染并因此植入脑海, 成为一辈子难忘的场景 (周晓虹, 2020)。

四、叙事—选择：历史场景的建构

阿普菲尔鲍姆 (Apfelbaum, 2010: 85) 在讨论哈布瓦赫的社会记忆理论时, 曾肯定地写道: “对于哈布瓦赫来说, 回忆或我们对过去经历的记忆, 不仅仅是简单的印记, 它们确实是对过去的积极选择和重建”。确实, 自哈布瓦赫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记忆的建构问题已经获得了人们过多的关注。不过, 尽管记忆内容的提取或回忆会受到访谈者的存在、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互动的微观影响, 但记忆毕竟属于私领域, 是个人的思维活动, 记忆的生成不会对外界产生影响因而也不会引起外界的反应, 直到它被讲述出来。如果说在记忆或讲述之时, 像哈布瓦赫所言存在着帮助人们“重建关于过去意向”的“集体框架” (Halbwachs, 1992: 40), 而“这些植根于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 就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 (Halbwachs, 1992: 22), 那么包括集体经历、社会文化环境及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集体框架对历史的建构就有两次: 一次是记忆及回忆 (讲述) 时的初级建构, 另一次则是涉及社会结构及其生活事件的叙事 (narrate) 时的次级建构。

叙事是一种结构性的对外表达, 有明确和专业的听众。作为自我呈现的受访者在叙事时就会有更多的考量, 因而受外界或结构的限制、影响可能也更大。叙事甚至与访谈对象的选择也颇有关联。众所周知, 口述史学界对访谈对象的定位发生过明显转变。早期以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为代表的口述史访谈对象都是政界、商界和社会名流, 20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兴起, 访谈对象才开始转为普通民众 (Thomson, 2007)。单从认识历史的角度来说, 没有哪一个群体能够妄称自己就能代表整个历史, 因此口述史应尽可能多地记录下参与事件各类人物和社群成员的声音 (Ritchie, 2015: 7), 以期尽可能反映历史事件的多个面向。

尽管上述两项口述史系列研究都尽可能地选择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与不同性别的受访者, 但是无论是哪种甄选方式, 都有可能带来访谈者常常会遇见的问题: 具有特殊叙事才能的人 (方慧容, 2001: 498) 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精英”, 不善表达的事件亲历者往往将事件的讲述权不自觉地让渡给了他们。如此, 最终的结果是, 每个群体中最能讲故事的那些人成了群体的代言人。这种对被访者无意而为之的“挑选”, 即便是由受访群体所做的自我选择 (比如, 用滚雪球方式寻找新的受访者

时，推荐人也总会说“找×××吧，他会说”），仍使得“叙事能力”成为一个潜在的或无意的筛选机制。

进一步，具体在访谈过程中，那些善于言谈的人也更擅长讲述中的起承转合、层层铺叙，更容易将听者带入当时的情境，加之细节翔实生动、评述有理有据，无形中增添了叙事的可信度。与此相反的是，不善言辞之人的讲述则没有那么精彩，这不但会影响到叙事的效果，也会左右访谈者的判断，而访谈者的访谈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口述史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被记录和保留下来。作为研究者，需要思考的是，那些看似“失败”的口述访谈，究竟是因为其本身没有意义，还是受限亲历者的讲述或叙事能力？我们一再声称口述史研究的使命在于倾听大众的声音，或“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以便寻找历史缝隙中那些不曾被看见和听见的芸芸众生，那么就应该去反思“叙事能力”对口述史研究可能造成的影响。虽然口述史的兴起实现了从“精英”到“非精英”群体的转向，但“叙事能力”却有可能再次将一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人排除在口述史研究之外。

你看我最近上课讲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比如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写《蒙塔尤》，就是写一个小村子里鸡毛蒜皮的琐事，但却再现了600多年前法国乡村民众的生活、思想和习俗。它告诉我们，事情的意义其实取决于我们对历史怎么看。历史究竟是一个写在报纸上的官方的叙事，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如果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历也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会有一个唤醒的作用，唤醒个人、家庭或其他社会单元的自我意识，去书写自己的历史。而到最后，历史书写的面相越多，价值观的多元性就会越强，社会就会更加和谐，而不是更加混乱（80ML013口述）。

再进一步，如果“叙事能力”关乎能不能说，那么“叙事意愿”则涉及到愿不愿说。叙事的意愿直接关乎历史场景的建构，尤其在记忆及相关叙事涉及“创伤性”事件之时。创伤性记忆有两种来源：一种源自个体经历，另一种由集体创伤塑造。前者包括事故伤残、亲人离世或个人不幸（坐牢、失业甚至身心俱疲的失恋），后者则涉及集体失误、民族灾难或国家危亡。如果说前一类遗忘如弗洛伊德所说，主要是个人心理压抑或回避的结果，那么后一类遗忘则是集体认同的产物：因为集体建构的因素，不仅与群体的灾难而且与群体的愚蠢或恶行相关的某些内容会逐渐

“被系统地排出集体记忆之外”（陆远，2020），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和文化的筛选机制在起作用。曾跟随导师参加义乌口述史访谈的一位德国留学生，在本项访谈中就坦陈，德国人一般会回避谈论二战的历史（90FM011 口述）。

虽说访谈者一般会注意避免触碰这类话题，但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常常对了解被访者的生命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与亲历者的个人生涯和心态变化有着无法割裂的关联，而关于这类经历的叙述更可以真正地反映被访者的情感世界。对于创伤性事件，“研究者指出，悲痛的第一步是震惊，接踵而至的是拒绝。人们可能会长时间驻留在拒绝的世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活着的人会愿意叙述，以纾解心头缠绕的过往”（Ritchie，2015：20）。

在“三线”的一次访谈中，我带着疑惑谈了近40分钟，甚至一度觉得进行不下去了，被访者对我始终保持着距离，对过往不愿深谈。他是一位出色的测绘专家，很擅长（甚至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又做得风生水起（获得过很多荣誉），但在述及那一段热火朝天的奋斗岁月时总有一种无力感笼罩着整个访谈。一直到被访者无意间说起40年前自己12岁的儿子在工地玩，因施工安全措施不到位而坠亡……从他对事故的解释、对儿子聪慧的夸赞，以及讲述过程中流露出的不甘、惋惜、悔恨，你突然就理解了他之前抵触的全部成因。但是，这段尘封已久的经历讲完后，被访者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从不愿意多聊，到后来心结打开，讲述的热情也提高了。我想，如果没有这一段创伤性记忆的讲述，作为访谈者可能很难理解被访者后来人生轨迹的转变，他对世界的态度，以及对自己一生的评价（80FA008）。

口述史从来不是对记忆的简单笔录，而是通过亲历者的讲述或叙事对过往历史的重新梳理和建构。被访者是否愿意及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最隐秘、最内在的记忆展现出来，决定了访谈的清晰性和饱满度。

看不见的宏观社会结构背景和看得见的微观访谈环境对于叙事会产生双重影响。就宏观背景而言，亲历者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受到环境中各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集体观念、日常风俗甚至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他在回忆尤其是讲述时就会对过往的历史进行选择性的复述（遗忘有时就是在这种选择中不断被舍弃的内容）和重新建构（叙事）。这种复述和建构与一般意义上的“说假话”不同，

因为亲历者在叙事时既受着集体框架的左右，也受到现实可感的日常关系网络的影响，当然亲历者对这两者的制约可能都意识不到。在分析“青春无悔”的知青集体记忆时，周晓虹（2022a）发现1988年最早喊出“青春无悔”口号^①的成都知青，恰恰也是1978年集体请愿要求回城的十万云南兵团知青中的一员。他们十年前誓死也要“返城”，与十年后高歌“青春无悔”，这种“翻转”与个人品行无关，而“与大部分知青在数十年的光阴之后，渴望摆脱社会边缘地位，而主动靠近主流话语……有着密切关系”（周海燕，2021：124）。

在讲述历史场景时，影响最大的微观环境恐怕就是他人在场。当然，无论是子女还是配偶，作为亲友的他人在场，对年长者可能是一种情绪上的支持，也可以对其生命历程中的时段和事件予以提示，但他人在场带来的干扰也不言而喻，所以里奇（Ritchie，2015：49）认为最理想的口述史访谈是一対一的方式。进一步，“他人在场”是“现实的、想象的和暗指的”（Allport，1985：1），因而历史场景的复现很难摆脱建构的力量。本研究团队在“三线建设”访谈中就发现，即使退休多年、和单位早无联系的老人在头脑中都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叙事红线”，“即使只有你与亲历者两人对谈，你也能够发现国家在场、单位在场、他人在场。这种在场决定了口述史是一种个体叙述，但叙述不能不涉及他人、社会关系或权力结构，因此具体的叙述既反映了讲述人的社会网络，也反映了讲述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制约因素。”（周晓虹，2021：4）

五、共情与抽身：个体与历史的连接

至此，本文围绕口述史访谈中历史场景的搭建，讨论了三个最重要的过程：倾听—提问、回忆—讲述和叙事—选择。这些过程显示，只有在访谈者和被访者的互动下，所搭建的历史场景才是具有社会学意蕴的。这种研究者（访谈者）与亲历者（被访者）共同搭建的历史场景能够触摸到“人”的行动质感和社会的纹理。对于一场成功的口述史访谈来说，要想切实地进入历史“巷道”，就不能缺

^① “青春无悔”的说法最早出现于1988年成都地区知青搞的一次同名展览和其后出版的同名书籍——《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此时距离他们1968年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去云南边疆“上山下乡”正好20年、1978年集体“大返城”正好10年，或者说正值青春已逝的岁月。

少那些彼此触动感情或灵魂的瞬间，即访谈者与受访者因深入互动而产生共情的时刻。社会学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强调研究者要在研究中要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但是由于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无法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价值无涉，也越发强调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解与参与，并意识到“田野调查不（仅）是一个运用理性获得新奇发现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研究者的身心自我成长的过程”（周飞舟，2021：53）。

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议题。在从事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那里，一开始问题就表现为相互对应的两端：其一，当涉足自己所陌生的文化时，研究者能否以所谓主位（emic）立场或当事人的眼光，去体察被研究者的文化；其二，如果研究自身文化或本民族成员，研究者能否做到反躬自省，站在客位（etic）的立场上观察，避免因情感带入而无法客观。费孝通（1997）面对上述两大难题曾指出，人类学者在从事异文化研究时要“进得去”，而在进行本文化研究中要能做到“出得来”。

虽然本文提及的两个口述史系列大多聚焦于本文化中的群体，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地域、职业尤其是时代差异性，依旧决定了研究中存在“进得去”和“出得来”两大问题。在纪念“江村调查”80周年之际，周晓虹（2017）在《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國化》一文中用“他者化”（othering）和“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这一对概念论述了如何应对上述两大难题：如果说“他者化”是通过与所研究的原先陌生的社会、文化或人民取得认同，进入他们的世界，以他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理解他们生存其间的社会与文化，从而实现“进得去”；那么“陌生化”则是通过保持自身与研究对象尤其是自小熟悉的研究对象或环境之间的距离实现“出得来”，也就是实现研究者的独立性，站在“庐山”之外见“庐山”之全貌。应该说明的是，这两个概念一个强调走近，一个凸显远离，看似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分析路径，但事实上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周晓虹，2017）。比如，费孝通在从事江村调查时，既遭遇了作为学者或人类学家如何“进入”农民生活世界的一面，也面临作为吴江当地人如何“走出”因本土文化制约而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另一面。

尽管“他者化”和“陌生化”两个概念能够比较好地诠释费孝通先生的“进得去”和“出得来”两种路径，但考虑到在口述史研究中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具有鲜明的心理互印性，还可以借用前述心理学的概念“共情”（empathy）来描述“他者

化”的过程。同时与此相应，用“抽身”（withdrawing/getting away）来描述“陌生化”的过程。当然，从事口述史研究时，首先遇到的是如何“进得去”的问题，所以“共情”也是获得亲历者信任或能够与其共返历史场景的第一步。在本项研究中，参加鞍钢口述史项目的一位主访人，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曾在杨善华教授指导下做过定性方向的论文，后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主要从事定量分析，时隔多年他依旧记得“当时杨老师跟我讲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访谈的时候要有一个类似于共情的过程，所谓共情，或者说移情，就是要和被访者（处）在一条情感基线上”（70MP019 口述）。对此，曾先后参加过多项工业建设史访谈的60FP009也深有同感。她不仅因前几年曾主持某档情感类电视节目而赢得无数“粉丝”，与大多被访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关系，而且因上大学前曾随当兵的父母在离罗布泊不远的核试验基地马兰生活过多年，比她大几岁的姐姐就出生在比干打垒还要艰苦的地窝子里，戈壁滩里整天吃的就是土豆、白菜、洋葱，这样一种早年经历使她很容易找到与那些青壮年时代远离沿海城市、挈妇将雏奔赴三线并奉献了一生的老人们叙事时的共情基线。

我访谈过一个从东北来的老先生，那天他哭了。哭得真是猝不及防，讲着讲着就哭了。我想，如果年轻人的话，他可能不会因为什么东西而情绪如此激烈，但老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尤其是那些他为此付出很多的事业、工作或者某个人，以及当年的艰难困苦时，就真的特别容易激动。尤其是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的问题：“您回顾这一生您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吗？”真的，面对这样的询问，大部分人都会很激动，尤其是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最容易被触动……所以那天我说，我特别能理解您，我现在想来如果有人讲起马兰的那一段，我也会哭。这样，我就回到了一个我们共同的经历上来了。都说我们的父辈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说在这一点上我的感触也特别深（60FP009 口述）。

口述史研究是关于“人”的研究，作为资料收集过程的口述史访谈更是一场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与理解的双向抵达。从倾听—提问、回忆—讲述和叙事—选择这三个过程可以看到，每一个过程都需要人们真实情感的投入，这样才会有尊重、理解和体察，才会有沉浸式的回忆和诚恳的交流。因此，“共情”是口述史访谈应

努力达成的一种状态。共情最初的意涵有着哲学和美学的渊源，是指将主体的观点和情感注入客体对象当中，强调主体进入客体内部的过程。具体说来，共情是指个体能够感受到他人的体验，并基于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感知和理解而做出恰当的反应。费孝通晚年提倡“将心比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周飞舟（2021）将此解读为研究者在田野中要保持一种“温情与敬意”并存的心态，即同情的理解和尊重的态度，是反思性的、包容的、变化的一种研究心态。口述史访谈中所期达成的“共情”可能比“将心比心”更进一步，其落脚点不在于研究者自身修养或素养的达成，而是强调研究者要置身于被访者的生命事件和情感世界之中。共情式的理解不仅是单向植入式的同情理解，也是在知晓了被访者的人生境遇，知晓了个人与其所处的广阔历史背景和宏大社会结构之间千丝万缕的牵扯之后的感同身受。如此，口述史中的“共情”不只是单纯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情绪或认知的共通，也因其所具有的历史纵深感而彰显出社会文化的意蕴。

当然，因“共情”而“过分认同被访者也可能会造成诸多障碍”（Ritchie, 2015: 86）。因此，作为与“共情”对应的一个概念，“抽身”的意义就在于提醒研究者应该始终保持研究的自觉意识。就访谈而言，作为研究的发起人和设计者，要把控访谈的走向。比如，当被访者陷于一个细微的话题滔滔不绝，访谈者此时就不能一味地听之任之，而要适时、适当地打断，将访谈拉回正轨。或者，当访谈者发现叙述出现大段且明显的不真实时，也应保持警觉不能不分真伪全盘接受。更为重要的是，访谈者要思路清晰，无论怎么共情，访谈者和被访者的世界都是存在区别的，既不能让被访者牵着鼻子走，也要防止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理解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杨善华、孙飞宇，2005）。

除了访谈者要能够跳脱出访谈情景的局限保持理性的判断之外，“抽身”的更深层含义在于，访谈者同时也应有能力引导被访者从个人经历中“抽身”，将其对自我生命历程的认知和感悟带回他曾经历的历史场景之中，还原一个群体或一代人的集体生命史。这种还原的意义，一如社会学家埃尔德（Elder, 1999: 295）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整一代美国人的影响时所述——某种全民共有的集体经历，常常具备了从总体上理解某一民族或群体历史的解释力度。具体到本文所述及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中的社会学家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特例，在由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中，他们相似的生命历程使得无论是访谈者还是被访者都更具备“共情”的可能，而经由社会学的学科训练养成的学

术素养也使得双方皆具清晰的“抽身”意识。这项研究，不仅呈现了“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与人生感悟，特别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及学术演进的主观影响，也折射出客观历史进程如何通过影响学者的人生轨迹，最终实现了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再造与历史制约”（高玉炜、周晓虹，2021）；同时也彰显了个体是“如何投身历史之中，回应时代挑战，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某一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的话语实践”的（周晓虹，2022b：139）。换言之，虽然访谈的只是个体，但通过个体可以看到历史和社会的律动（杨善华、孙飞宇，2005）。因此，由个体记忆突生出集体记忆，由个人生命史折射出了我们时代的整体历史。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共情”和“抽身”的实现不仅只是访谈者的努力，也同样离不开被访者的配合与呼应。一如本文在最初的文字中描述的那样，口述史访谈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在访谈的任何一个过程中都充斥着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密切互动，以及建立在互动之上的给予和理解。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访谈者和被访者共同搭建了过往的历史场景，并在这一历史场景中通过单纯的重返和复现，借助当下的理解实现了对过往的重建。

参考文献：

- 阿德勒，2016，《理解人性》，王心语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 常江潇、周晓虹，2021，《新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以洛阳矿山机器厂为例》，《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车文博，1998，《西方心理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德拉埃斯马，D.，2014，《记忆的风景：我们为什么想起什么，又为什么遗忘》，张朝霞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
- 董方杰、周海燕，2021，《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 方慧蓉，2001，《“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北农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空间 记忆 社会转型》，杨念群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费孝通，1997，《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读书》第10期。
- 2004，《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思想战线》第5期。
- 高玉炜、周晓虹，2021，《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探索与争鸣》第6期。
- 郭于华，2003，《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驢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2013，《受苦人的讲述：驢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胡洁, 2020, 《口述史与田野访谈: 梳理与比较》, 《南京社会科学》第6期。
- 2021, 《个人叙事与集体记忆: 口述史的多维建构》, 《学术月刊》第11期。
- 胡洁、周晓虹, 2023, 《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 社会学学科建设40年》,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胡洁、周晓虹主编, 2023, 《集体记忆与多维叙事——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科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亚秋, 2003, 《“青春无悔”: 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23, 《口述史研究的人文性及其难解之题》,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陆远, 2020, 《集体记忆与集体遗忘》, 《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
- 孟庆延, 2018, 《从“微观机制”到“制度源流”: 学术史视野下口述史研究传统的力量、局限与转向》, 《学海》第3期。
- 2022, 《口述史的社会学中国谱系: 理论传统与本土经验》, 《求索》第1期。
- 彭圣钦、周晓虹, 2023, 《社会学本土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绵延不断的学术追寻(1930-2022)》, 《开放时代》第3期。
- 钱力成、张翻翻, 2015, 《社会记忆研究: 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王汉生、刘亚秋, 2006,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 《社会》第3期。
- 王小章, 2021, 《学人、学科与时代: 回望中国社会学重建四十年》, 《读书》第12期。
- 王余意、周晓虹, 2021, 《新人的塑造: 社会表征与个体认同——以青年学生苏文秉的日记为例(1951-1955)》, 《社会学评论》第4期。
- 韦尔策, 哈拉尔德, 2007, 《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善华、孙飞宇, 2005,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杨祥银, 2016, 《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应星, 2009,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 2016,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社会》第4期。
- 周飞舟, 2021, 《将心比心: 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周海燕, 2020, 《见证历史, 也建构历史: 口述史中的社会建构》, 《南京社会科学》第6期。
- 2021, 《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
- 周晓虹, 2017, 《江村调查: 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2020, 《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 《学习与探索》第7期。
- 2021, 《口述史作为方法: 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 2022a, 《集体记忆: 命运共同体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 《学术月刊》第3期。
- 2022b,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话语叙事——以40位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

学》第12期。

周晓虹主编, 2021,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Allport, G. W. 1985,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G. Lindzey & E. Aronso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1 (3r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Apfelbaum, E. 2010, "Halbwachs and the Social Properties of Memory", In S. Radstone & B. Schwarz (eds.), *Memory: Histories, Theories, Debat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Brown, A. S. 2003, "A Review of the déjà vu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3).

Elder, G. H. 1999,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French, S. A. 1995, "What is Social Memory?" *Southern Cultures* 2 (1).

Giele, J. Z. & G. H. Elder, Jr. 1998, *Methods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CA: Sage Publications.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rtelli, A. 1991,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itchie, D. A. 2015, *Doing Oral History (3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opes, L. 2015, "Community Oral History: Where We Have Been, Where We Are Going." *Oral History* 43 (1).

Thompson, P. 2000,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3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son, A. 2007, "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34 (1).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罗 婧